

姚江文化丛书



姚江望族

YAO JIANG WANG ZU

浙江古籍出版社

姚江文化丛书



姚江望族

YAO JIANG WANG ZU

诸焕灿 主编

浙江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姚江望族 / 诸焕灿主编.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80715-596-6

I. ①姚… II. ①诸… III. ①家族—研究—余姚市 IV. ①K8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28811 号

姚江望族

诸焕灿 主编

出版发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责任编辑 徐晓玲 张 姣 杨少锋
封面题字 集王阳明字
封面国画 陆一飞
封面设计 计文渊 刘 欣
激光照排 杭州立飞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新华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906 × 1298 1/32
印 张 13.625
字 数 315 千字
印 数 0001-2000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15-596-6
定 价 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总序（一）

余秋雨

如果借用中医的经络学说，那么不妨说，中华文化经络的主干，由大河组成。姚江文化则是整个文化经络中一个很关键的穴位。但是这个问题关涉到广远的背景，请允许我在这篇序里稍稍讲开一点。

中华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河川文化。从地理意义上，北部的草原、西部的高山都是中华文化的屏障和边极，对中华文化的直接影响不大；东部和南部的大海对中华文化来说是一种陌生的存在，一直没有建立亲和关系。因此，中华文化的中心不是游牧文化、山地文化和海洋文化，而是以河川为命脉的农耕文化。河川灌溉了农业文明，又会不断地破坏农业文明，所以治水成了中华民族最原始的使命，“大禹治水”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力的一个神话。这个神话作为一种“原型”永久承传，直到今天，我们仍在做治水的大文章。

中国有四条大江，北端的黑龙江、南端的珠江，遥相呼应，拢括了绝大部分国土；而中间部位则是两大世界级的河川：黄河和长江。其中，长江为世界第三大河，仅次于南美洲的亚马孙河和非洲的尼罗河。

中国的早期文明分布很广，但最集中的是黄河流域。不仅远古时代的三大帝王尧、舜、禹都建都在现今山西、河南的黄河边上，而且

后来作为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的咸阳、西安、洛阳、安阳、开封、商丘等都城，也都紧贴着黄河。

河川哺育了经济和政治，必然也会进而哺育文化。中国先秦诸子中的大部分哲学家、思想家如孔子、孟子、韩非子等都产生在黄河下游的山东和山西，因此他们所奠定的中国思想的经典模式，也可以说是黄河岸边的思考成果。当然，大智者产生于环境又超越环境，黄河岸边的思考的影响遍及九州大地，与此相应，黄河流域的艺术文化也达到了极高水平，即便是今天的旅游者也能从一座座雄伟的古代建筑和一处处雕塑、绘画、石窟中领略当年黄河文明的气势。

但是，中华文明的中心终于从黄河文明向长江文明转移了。转移的直接原因开始与文化无关，但后来却显现出越来越深刻的文化原因。

转移的第一个直接原因是黄河的自然灾害，黄河流经北方的黄土高原，每年要挟带十六亿吨黄沙泥土下来，致使下游淤塞决堤，在近两千年中，决堤泛滥已达一千五百多次，平均每四年有三次。这种频繁的危害使黄河流域越来越难成为人民生养安息之地，更不可能保持经济中心的地位了。

转移的第二个直接原因是黄河流域战乱频仍。邦国密集、政局更迭，使黄河流域成了征战的热土。每次战乱必然会带来大量民众、士人的南逃，南方本来还属荒蛮之地，却因南逃人群的开发而日益繁荣起来。尤其是公元4世纪初期的“永嘉之乱”，大量北方士庶避难南逃，直到很多年之后诗人李白仍然经常目睹南逃景象，而一见这种景象就联想起永嘉年间，他有诗写道：“三川北虜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

转移的第三个直接原因是逃奔的目的地长江流域平安富饶，足可

安居。长江也有洪灾，但近两千年间决堤泛滥约两百多次，平均每十年一次，只占黄河水灾的14%，再加上长江流域气候温润，雨水调和，土地肥沃，经济中心的转移有很充分的条件。

因此一般说来，晋代以前，黄河流域强过长江流域很多；由晋至唐，两河对峙；而宋以后，重心已在长江流域，越到后来，越是如此。

在世界历史上，许多次文明重心的转移常常伴随着严重的对抗，但奇怪的是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没有发生这样的对抗，两河文明很自然地交融在一起了，这使中华文明避免了一次致命的内部冲突，奇迹般地延续了生命。造成这种良好结果的原因是：

第一，长江文明早有悠远的准备和积累，底蕴深厚，高度发育，因此黄河文明在向长江文明转移的时候，并没有在文明浓度上减弱。源远流长的长江在黄河文化显赫之时，早就默默地濡养了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和吴越文化，不仅拥有先秦诸子中的老子、庄子、墨子，而且还拥有不同凡响的屈原和其他为数不少的文化大师，这使得纷纷南逃的土庶百姓不是走向荒昧，而是加入了一种新的文明。

第二，当长江文明悄然崛起的时候，黄河文明的核心精神尤其是儒家精神以其固有的宽厚和大气与长江文明建立了友好关系，重心转移变成了一种优势互补。在风格上，黄河文明雄浑、豪迈、粗砺；长江文明瑰丽、清朗、精雅，都与两河的自然风貌有关，又足以互相补益。当然，这除了两河的阔大气象外，还与两河文明同属农耕文明有关。

第三，一些以长江为生命的文学巨匠，以自己的万里行迹、开阔胸怀和精美作品，把长江文明推上了举世瞻仰的高峰地位，使文化即

便不仗经济之势也能巍然自立于历史。其中最突出的，有继屈原之后漫游于长江之畔的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等人。他们流连江滨，沉醉长江、描写长江，使长江成了一条文化上的大川，足以与黄河一起成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第四，与我们这部《姚江文化丛书》有关，从明代开始，长江下游的姚江地区，开始成为中国人文思维的一个重镇，以王阳明、黄宗羲为代表的姚江学者在思维的强度和深度上都处于整个中国文化制高点的地位。这种情况，使长江下游当之无愧而又平静厚实地取得了近代以前的中国文化的大部分总结权。此时此刻，小小的姚江所涌流的智慧，甚至已经不亚于滔滔黄河了。

任何突起的亮光总有远期的火种，姚江文化在明清两代的突然辉煌不能不让全国学人回过头去追溯地域性的历史原因。这种追溯为长江文明的履历增加了证据，特别是河姆渡文明的发现，更让人们把深长的思绪投向远古。也许，前面所说的重心转移其实只是皮相之见，把政治的集中、记述的丰富、表层的热闹当作了判定文化重心的标准？也许，重心这一概念的设定就是“大一统”观念的产物，中华文化其实一直处于多重心、也即多穴位的状态？但是，在尚未获得更多切切实实的突破性研究成果之前，我还无法放弃上述的宏观经络图谱。姚江文化，既是这一图谱的产物，又有可能改动这个图谱，这样的研究，太有诱惑力了。

历史终于推进到现代，姚江文化的魅力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而消失。改革开放以来，余姚经济发展迅速，社会日新月异，人们愈加产生了重新认识和发扬姚江文化的责任感。眼前这套《姚江文化丛书》，是在余姚市政府的主持下各相关单位合力编写的成果。格局完整、资

料齐备，充分体现了当代余姚人对姚江文化的一种自觉体认。历代余姚人总是以一种超乎寻常的文化自觉广受瞩目，这套丛书又提供了一个当代例证。

总序（二）

王永康

余姚以其历史悠久、人文荟萃而被誉为“文献名邦”、“东南名邑”，早已闻名遐迩。自2004年组织上调我来姚工作之后，通过对城乡各地的调查、名胜古迹的探访和与各界人士的接触，我进一步加深了对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了解，增添了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和感情。

这里山川秀丽，气候宜人，是风光旖旎的山水城市。放眼余姚，南屏巍巍四明山，北枕滔滔杭州湾，百里姚江横贯平原腹地。而作为全境中心的姚城，则是一水中流、四灵环抱、虹桥飞架、双城相拥的风水宝地。从四明幽谷中的道家洞天、唐诗之路，到杭州湾畔的四季绿原、观潮景点，处处都是引人入胜的佳境。如今，更成为一方旅游观光的绝好去处。

这里历史悠久，古迹众多，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姚江流域沃土遍野，宜于农耕与生活。1973年在姚江之滨发现的河姆渡遗址，以大量的出土文物，证明了早在七千年前，先民们就在这里人工栽培水稻，捕鱼打猎，构建干栏居舍，形成原始村落。余姚因而被中外考古学家确定其与黄河流域一样，同为中华民族发祥地，同为人类文明的摇篮。继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之后，这里又有“舜耕历山”、“禹藏秘图”之说，当代著名学者史树青教授因而认定余姚

为虞舜所出的“姚墟古迹”。

这里人杰地灵，名家辈出，是人文荟萃的文献名邦。余姚自秦时置县两千余年来，“江山代有才人出”。两汉之交的高士严子陵、东吴《易经》学家虞翻、东晋天文学家虞喜、初唐书法家虞世南、南宋名臣孙秀等，皆名垂千秋。明清两代，这里更因孕育了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王守仁（阳明），著名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梨洲），以及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朱之瑜（舜水）而蜚声海内外，以至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赞叹：“余姚以区区一邑，而自明中叶迄清中叶二百年间，硕儒辈出，学风沾被全国以及海东。”

这里众志成城，英勇抗战，是名扬全国的革命老区。余姚人民爱国爱乡，历来有与入侵外敌、反动统治进行斗争的传统。明嘉靖年间，倭寇侵扰，姚北群众在抗倭名将胡宗宪、戚继光率领下奋起抵抗，终于荡平了倭寇。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开辟了以姚南梁弄为中心的浙东（四明山）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包括四明、三北、会稽、浦东四个地区，十四个县域的人民政权，名列全国十九块抗日根据地之一，为余姚历史谱写了光辉的一章。

这里区位优势，经济繁荣，是东南沿海的新兴城市。余姚地处浙东宁绍平原中心，东接宁波市区，西临绍兴、杭州，物华天宝，经济发达。沪杭甬铁路、杭甬高速公路和杭甬运河横贯境内，空运、海运近在咫尺，交通十分便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余姚借改革开放的东风，一、二、三产业齐头并进，城镇化建设加速推进，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升，综合实力连年排在全国百强县（市）前列。

而今，余姚这座千年古城，正以强劲的步伐，朝着经济更具实力、文化更富特色、环境更加优美、社会更趋和谐、人民生活更为殷实、

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现代和谐宜居城市目标迈进。

在沧海桑田的几千年，在改革开放的几十年，余姚人民在农业、水利、工商、文艺、教育、宗教等各个领域，创造了惊人的业绩，留下了大量历史遗迹和文史记载。继被浙江省人民政府命名为全省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之后，国务院又先后确定河姆渡文化遗址、王阳明故居、黄宗羲墓和浙东区党委旧址等胜迹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余姚的光荣和幸运！

为了留存文史资料，记载前贤和今人的创业行迹，使之成为弘扬优秀文化、进行爱国爱乡教育的生动教材，中共余姚市委、市人民政府研究决定编辑出版这套《姚江文化丛书》。作为建设文化强市工作的重要内容，并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相衔接，争取用四到五年时间，完成全书的编印任务，以期姚江千年文脉绵延不绝，并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继承发扬，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

序 言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在中国，数千年来，许多同姓的家庭以血统为纽带组合成为家族，成为有别于社会行政系统组织的基本单位。虽然子孙繁衍，分门立支，或迁居别地，彼此见面仍然是“同姓三分亲”，“五百年前是一家”，格外亲热。

自东汉初年以来，许多人以举孝廉而进入官场阶层。一个家族成员进入官场的人数多了，就逐渐形成为地方上尊显的名门望族，尤其是在魏文帝曹丕制定“九品中正制”之后，社会上更加重视门第。“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一切以门第显贵为荣。谱牒流行，士人往往攀附或托名于望族之下，以相标榜，更助长了名门望族的气势。宋人秦观在《王俭论》中写到：“自晋以阀阅用人，王谢二氏，最为望族，江左以来，公卿将相出其门者十七八，子为主婿，女为王妃，布台省而列州郡者不可胜数，亦犹齐之诸田，楚之昭、屈、景氏，皆与国同其休戚者也。”

任何一个名门望族的形成，有其家族历史、地域、先祖业绩等渊源关系，族中子弟也必然受到出生地社会环境、家庭渊源、血统遗传基因、历代家族人员的文化素养、居住地变迁等众多方面的影响。家族史、家族文化及其酿造的家族精神是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尤其是那些人才相继、名流辈出、学术传承对国家政治、经济、

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名门望族，其家族的源远流长、兴衰成败以及丰厚的文化底蕴在社会、政治、文化史研究中更具有重要价值。世代官宦大族和文化世家的观念大有区别；豪门大族和清贫之家的意识大为不同，同一大族的成员因迁居流徙而生活于不同地域环境之中，亦必然产生较大的差异。名门望族的风范及他们的兴衰，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互为影响。名门望族的家族文化及其酿出的家族精神、独特家风的兴衰沉浮，揭示出其背后所蕴含的历史变迁和文化传播信息。

余姚地处东南，南枕四明山，北濒杭州湾，地理位置优越。全境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阳光充沛；温暖湿润；四季分明；雨热同步。自然资源丰富，适宜人类居住，故较早就有先民开发于此。在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先民们生活、劳动于姚江两岸，创造了远古文明。由于海浸的来临，整个浙东平原被海水所淹没，河姆渡先民被逼外迁，以致出现了河姆渡文化遗址的断层。但时隔千百年之后，随着海浸的中止及后退，海岸线随之东移，中原和北方地区的民众又先后迁徙到姚江流域。究其原因，除姚江流域环境优越外，还有中原和北方地区战乱频发，政局动荡，权力屡屡交替，或统治阶层内讧、夺权、残杀时起，祸及民间，或外敌入侵，烧杀抢夺，人们生活极不安宁，故此多次向相对安定的南方迁徙，而姚江两岸正是南迁之民选择的理想之地。例如，周灭商、东晋南渡、五代之乱、金兵南侵及南宋建都江南等等政权变更时期，为躲避北方战火，中原豪门巨族以及普通百姓纷纷南迁，卜居姚江两岸。

自汉魏晋时期所形成的王、谢大族，早在两晋之交，即有琅琊王氏迁徙到浙东定居，两宋之际，有更多的王姓子弟卜居姚江两岸。宋

末元初,谢氏迁徙余姚泗门。众多的中原巨姓世族,如史、邵、徐、黄、周、朱、孙、诸、张、陈等氏族,或早或迟先后流徙迁居余姚,给姚江流域带来了中原文化,与当地的原生文化相融合,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姚江文化,余姚的政治、经济、文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使余姚成为“越州巨镇”“浙东重镇”。同时又在姚江的孕育之下,产生出众多的姚江名人、先贤,如被余姚人尊为“四先贤”的严子陵、王阳明、朱舜水、黄梨洲,为祖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从而形成了姚江地方的巨姓望族、著姓大族。

“邹生(邹学柱)曰:姚中名族以十数,而朱氏与焉。”(孙鑛《寿朱母冯太君八十序》)“君世孙氏,为姚江八族之一。八族者,前四族为毛、邵、徐、韩;而后四族则孙、王并吕、谢也。后四胜前四,而孙为尤胜。”(毛奇龄《孙光祚墓志铭》)先后相继,在整个姚江流域出现了十余个望族,众多的著姓大族,为姚江流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生、发展、兴盛,起到了极大作用。

姚江望族的形成,各具特性的宗族文化、族规、宗族风气习性,如慈孝治家、诗书耕读、勤学应举、为官清廉等,必然影响到民间。一个家庭形成之后,建宗祠、修家谱、立族规、订家训,把整个家庭子弟团结在宗祠之下。家庭子弟科举入仕,为国家、民族立了功,不仅是个人的光荣业绩,也是一个宗姓门第的荣耀,事迹即被载入宗谱,以其为下辈子孙的榜样。族规、家训难免有封建糟粕,但也有不少积极的内容,如教育子弟慎终追远、继承先祖德业、耕读传家、勤俭立业、以德律身、以诚处世、尊长慈幼、睦族友邻、济贫助困等等;有的家族由族人捐产捐款,购置族产,除资助族内贫困家庭子弟读书求学、老病丧葬,有的还举办慈善事业,面向社会。所有这些,对于促

进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国家安定，都起了很好的作用。这是一种民族传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更有各大族所建的义庄，行事规范、体恤扶贫、助学励志、灾期赈济等等，激励了民间读书识理、仪礼交往等风俗的形成，促进了地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深深地影响着姚江地区民风的改善。

由于姚江望族、著名大姓的精英们为祖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姚江人物甲天下”，致使余姚之名淹披宇内，远播海外，成为“东南最名邑”“文献名邦”。余姚的今天是余姚的昨天之延伸，为了使人们不要忘记过去，不要忘记历代先贤所创立的业绩，由余姚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部分会员编写了这本《姚江望族》，以供后人了解姚江主要宗族历史和宗族文化。是为序。

陈建素

二〇一〇年五月

目 录

总序（一）	余秋雨（1）
总序（二）	王永康（1）
序言	陈建泰（1）

姚江王氏	诸焕灿（1）
泗门谢氏	谢建龙（51）
孙家境孙氏	王孙荣（81）
余姚虞氏	郭一舟 方其军（102）
姚江下河严氏	谢玲玲（123）
姚江邵氏	郑建立（139）
余姚黄氏	黄申章（163）
姚江朱氏	郑汉良（189）
余姚史氏	施长海（207）
余姚徐氏	施长海（250）
姚江柏山胡氏	王孙荣（283）

余姚丰山毛氏·····	谢建龙 (301)
余姚周氏·····	谢建龙 (312)
姚江沈氏·····	褚纳新 (322)
姚江义门陈氏·····	褚纳新 (339)
姚江部分大姓述略·····	诸焕灿 (357)
后 记·····	(412)